

中國經濟還能再增長多久

END OF HYPER GROWTH IN CHINA ?

中國經濟 還能再增長多久

張軍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前 言

編輯出版這本書是一個偶然，也是一個必然。

2013 年 5 月 12 日下午，我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出席了“重要宏觀經濟統計指標解讀”學術研討會。除了會議的主題以外，實際在會上和會後的飯桌上大家無不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可能性進行激烈的討論，其中不乏憂慮與悲觀的言語。為甚麼大家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不再充滿樂觀的情緒？是因為在經濟發展問題上中國做錯很多了嗎？

在從北京回上海的高鐵上，我的頭腦一直未能擺脫這一問題的干擾。想來想去，那些過於悲觀的看法其實多數無非是人云亦云的膚淺結論罷了。那些似是而非和荒謬的結論大行其道已成為了當今中國的社會現象，見怪不怪也罷。過去這些年，在公開場合，謹慎的分析和樂觀的言論少之又少。我突然覺得自己這幾年在不同場合發表的有關中國經濟未來增長前景分析的言論反而一以貫之，均以未來 10—20 年的增長前景為主題而展開，如果能彙集起來不就是對那些悲觀言論的一個正面回應嗎？

回到上海之後，我就馬上給出版社的林君秀主任發去郵件，把我的這個想法告訴她，沒有想到我們一拍即合。於是，我決定在我發表的關於中國經濟未來增長前景的文章中選編那些篇幅較長的作品並經反覆斟酌，決定冠之以《中國經濟還能再增長多久》出版。

但編輯一本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前景分析的書，也應該是我這一階段

思考和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必然的想法。這些年來，我與我的同事和學生們合作研究中國經濟，多有感受和心得。認真和獨立的研究總是能讓我發現，很多問題的真相並不像那些流行的看法描述的那樣直截了當。大多數學術界的人，特別是我的經濟學家同行（包括那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只要不在自己從事的狹窄的研究領域內，一般在很多問題上也只是職業的外行，人云亦云在所難免，甚至在一些問題上輕易地說出一些不適當或似是而非的言論來，也並不奇怪。而發達的媒體充當了不動腦筋的放大鏡，渲染了那些膚淺的看法和結論。結果，一個經不起嚴肅分析和推敲的觀點往往就大行其道，佔據了我們的主流話語。

舉例來說，現在幾乎所有的財經記者都認同這一不脛而走的說法：中國經濟的增長過去是靠了投資和出口，未來要靠消費和內需。我曾接受一家海外著名媒體的記者的電話採訪，採訪中就問我：“中國經濟過去是靠了投資和出口拉動，現在的投資過多，消費不足，出口疲軟，那麼你認為未來要靠甚麼呢？”我開玩笑說：“我不知道未來靠甚麼，如果我知道了，我不就是神了嗎？”

作為經濟學人，我不知道一個經濟的增長過程在當下中國的知識和傳媒界為甚麼可以這樣來理解，只覺得有些滑稽可笑。熊彼特的理論也好，索洛的經濟增長理論也罷，都揭示出經濟的增長是一個長期現象，是勞動生產率和 / 或技術不斷提高和升級的過程，而這兩者都離不開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長期投入與積累。這個道理難道很難理解嗎？為甚麼在增長問題上要把投資與出口和消費在概念上並列起來呢？從 GDP 增長的源泉而言，投資可以增加資本存量和促進技術進步，自然是 GDP 增長的原因，而出口和消費不過是 GDP 增長的結果。而現在流行的說法卻

是，中國經濟增長過去靠了投資，未來要靠消費，這不是邏輯混亂嗎？從長遠來說，哪有只增加消費和出口而不增加投資就能保持 GDP 增長的道理？未來如果沒有長期的（物質的和人力的）資本積累，我們的產業結構和技術如何能實現升級換代？我們的勞動力如何能提高技能和素質？我們如何能創造出高附加值的產品與服務來？沒有這些，我們還能保持不斷提高收入和消費水平的能力嗎？我們還能步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和趕上發達國家的生活水準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一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是由長期因素決定的，絕不是由短期的需求因素決定的。長期因素包括資本形成的能力、勞動力的數量與年齡結構，人口受教育的程度、研發投入和技術進步的速度，以及制度的改進等。但就是這樣的樸素道理卻被多數人不願意面對，寧願接受一個消費開支決定經濟增長的謬誤，而寧願接受這個謬誤只是因為它服務了大多數人當下糾結的情感而不是理性。

不可諱言，以上流行的言論不是沒有出處的。在中國經濟未來增長前景問題上，經濟學家內部流行的看法常被概括為所謂的“結構失衡”。那些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悲觀的經濟學家均對其所謂結構失衡情有獨鍾，但卻流於膚淺的分析邏輯。比如，在簡單觀察到在國民收入中投資佔比上升和消費佔比近 10 多年來下降的趨勢之後，便輕而易舉地判斷得出中國經濟的結構出現了嚴重失衡的結論。不僅如此，消費佔比持續下降還被解釋為生產要素價格（如利率和工資）長期被體制扭曲的結果。由於總是習慣於用要素市場上各種扭曲來看待經濟增長問題，因此多數經濟學家判斷說，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今天能否成功實現經濟結構的“再平衡”。毫不誇張地說，“結構失衡”和“結

構再平衡”今天已經成為經濟學家之間討論中國經濟前景的基本概念框架。但不幸的是，這個框架是建立在錯誤的理論和對中國統計數據膚淺的理解之上的，不值得維護。

其實，看到所謂結構失衡的經濟學家多半都是忽略了經濟增長將伴隨結構變化發生的事實。大多數經濟學家習慣於用教科書上的均衡和最優化概念的邏輯來考慮、觀察和判斷經濟現象，作為邏輯分析的基準，這並沒有錯，但如果過於教條和生搬硬套這些概念和原理，那就錯了去了。當我們面對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我們就需要懂得，增長和結構變化只會在遠離均衡（穩態）的狀態下才會發生。換句話說，穩態均衡就像一個引力，增長和結構的變化總是有朝著那個方向靠近的內力，但又不斷被外力推動而偏離。這就是結構變化和經濟增長現象。理論上說，一個關於經濟結構平衡或最優化均衡的靜態理論描述的不是經濟增長，而是靜止的穩態，它是不能直接用於解釋經濟增長現象的。實際上，正像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黃育川博士最近也撰文指出的那樣，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到的是，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台灣地區這些經濟體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不平衡增長，消費佔 GDP 比重曾經下滑 20 至 30 個百分點，然後才實現較為平衡的增長的。事實上，沒有證據證明較平衡的增長模式將帶來工資及消費支出更快增長這一假設。如果人為刺激消費以及過早地平衡經濟結構，中國可能失去提高生產率的機會。而這，用黃育川博士的原話說，原本可以通過實施改革、推動城鎮化進程更有效進行、允許私營部門發揮最大潛力來實現。

以上這些是我這些年一貫堅持的看法。為此，儘管個人的聲音非常微弱，我還是在不同場合發表了多篇文章和演講來試圖糾正我們那些流

行觀點的偏誤。本書收入的這 10 篇文章算是其中的代表，而且發表的年份是離現在最近的。

這 10 篇文章中有 6 篇是基於我 2011 年以來發表的演講而寫成的。

第 1 篇是 2012 年 3 月 15 日我在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舉辦的“中國深度研究高級講壇第四十七講”的講座文稿。講座於 2012 年 3 月 15 日晚在復旦大學光華樓吳文政報告廳舉行，吸引了眾多的學生，現場氣氛極其熱烈。2012 年 4 月 16 日演講稿以“中國經濟還能再增長多久？”為題在《文匯報》每週講演版整版發表。2012 年 7 月 5 日被《新華文摘》2012 年第 13 期全文轉載。

第 4 篇是我在 2011 年 5 月舉行的“上海論壇”上的主旨演講稿，2011 年 6 月 12 日以“中國經濟再十年：張軍教授在‘上海論壇 2011’上的主旨演講”為題在《解放日報·思想者》發表。基於這個演講而寫成的另一更精練的文章於 2011 年 7 月 4 日以“中國經濟再十年”為題在《經濟觀察報》觀察家版面整版發表。

第 5 篇是 2011 年 8 月 5 日下午應國泰君安之邀在“國泰君安宏觀經濟方法研討會”上發表的演講。2011 年 11 月 6 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最先以“為中國經濟轉型聲辯”為題發表了這個演講的精華版。而它的完整版則發表在《學習與探索》2012 年第 3 期上。後又被北京大學的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的內部稿《觀察與交流》刊載。2012 年 6 月 20 日再次被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 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經驗》第 6 期全文轉載。

第 6 篇是根據 2011 年 11 月 4 日我在 *World Economy* 年度中國講座上的英文演講經整理、修改和補充而成的。這次的年度演講是應英

國諾丁漢大學校長、*World Economy* 雜誌主編戴維·格里納韋 (David Greenaway) 教授的盛情邀請而發表的，在英國諾丁漢大學 (寧波校區) 舉行。這篇演講稿的中文版於 2012 年 12 月 26 日以“理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機制：朱鎔基可能是對的”為題並作為首篇發表在了吳敬璉先生主編的《比較》第 63 輯上。而基於演講的英文論文 *Zhu Rongji Might Be Right: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在國際經濟學界的 SSCI 雜誌 *World Economy* (Vol. 35, No.12 (December), pp.1772-1732) 上發表。

第 7 篇是我 2012 年 11 月 9 日在復旦大學“2012 復旦發展論壇”上的演講稿。論壇的演講嘉賓還包括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和著名作家王安憶。之後不久，演講稿應當時的主編黃頌傑先生之邀作為首篇發表在了《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 年第 1 期上。

第 9 篇是基於 2012 年 9 月我與來訪的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巴里·諾頓 (Barry Naughton) 教授進行的一場對話而寫成的。為了方便讀者的閱讀，我把諾頓教授的現場對話部分也附在了後面。這個對話的文字稿由出席對話現場的《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的記者柯白瑋負責整理並經我修訂，2012 年 10 月 16 日發表在《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上，發表時編輯用了“與巴里·諾頓談中國經濟的前途”的題目，其中我的文章是以“中國的增長階段轉型將會更平穩”出現的。

除了以上 6 篇演講稿之外，本書的第 2 篇和第 3 篇文章是我在 2012 年 4 月為《大預測》一書所寫的長篇書評。由於篇幅比較長，我把它拆成兩篇。事實上，這篇書評最初於 2012 年 5 月 5 日和 20 日也是分兩次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上刊載出來的。

分稅制改革如何改變了增長的激勵？	122
地方政府的角色與土地財政	136
結束語	142
鄧小平是對的：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153
揭開中國消費過低的謎團	169
中國的增長階段轉型將會更平穩：與巴里．諾頓對話	177
危機、改革與中國的長期增長	199
經濟增長的潛力和長期因素	203
改革的動力與阻力	219
危機與可改革性	224
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改革	229
改革公共部門	234

中國經濟還能再增長多久？



到2020年以後，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一定會慢下來，但不會太低（如5%）。我認為平均而言再維持10年的6%—7%是完全可能的。這不僅因為東亞經濟在人均收入達到中高水平以後都保持過較快的增長，國際上有先例，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內部的地區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資和生產率的改善空間。

各位同學、各位老師，看到今天的場面我很感動，我剛剛跟老鄧（復旦大學特聘教授、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鄧正來——編者註）在說，這個地方我選對了，因為我本來可以在經濟學院做這個報告，而選擇高等研究院這個平台是因為老鄧以及高等研究院比我更有號召力，所以今天來了這麼多的聽眾，我首先表示感謝。同時我還要感謝韋森和石磊兩位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們今天也來出席這個報告會，擔當評論，也是對我的捧場。其實，今天有這麼多的同學參與，已經說明大家對中國經濟的未來這個話題非常感興趣。而自從 2010 年以來，國際上關於中國經濟未來的討論熱情也重新高漲。為甚麼西方那麼關注中國經濟的未來？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變大了，變得重要了，人們不僅不能忽略中國經濟，而且必須要了解，在不遠的將來世界經濟格局將因為中國的經濟主導而發生怎樣的變化。

在中金研究部的黃海洲先生說，他最近到了華爾街，親身感受到華爾街的很多投行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很不看好，而且是非常認真地不看好。仔細想想他們不看好的理由後，海洲發現，那些對沖基金或許認識到當前唱衰中國是能有機會掙錢的。

當然，唱衰中國的還有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可能最有名的要數那兩位美國經濟學家。一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他對亞洲整個

都是唱衰，而且唱衰 20 年了。還有一位是紐約大學 Stern 商學院的魯比尼。他們一致唱衰中國，認為中國經濟在兩到三年的時間裡就會出大的問題，就會熄火。這些言論很有市場。有的時候，你對中國經濟的樂觀反而不受歡迎，甚至得不到重視。這個現象很奇怪。

過去三年裡面，我比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時間去閱讀、觀察和思考中國的經濟，這使得我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個人在中國經濟未來前景問題上的看法。但是，要回答中國經濟還能再增長多久的問題，的確是比較困難的，因此我只能做一些簡單的討論，希望引起大家進一步的思考。今晚我想談三個小的題目：第一，為甚麼我們能實現高增長？第二，未來我們還能增長多久？最後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影響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條件，以及這些條件在未來是不是能得到滿足。

我們為甚麼實現了高增長？

按照當年價格計算的中國的經濟總量現在已經有差不多 50 萬億元，換算成美元，將近美國經濟總量的一半了。不僅有如此巨大的總量，而且它的增長速度還非常快。按照名義值計算基本上平均 5 年翻一番，即使按照可比價格計算，GDP 平均 7 年也可以翻一番。於是，到了 2005 年，中國的 GDP 總量超過了英國，2007 年又超過德國，到 2010 年剛好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估計按照目前的增長趨勢，只要中美兩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之差可以維持在 3.5 到 4 個百分點的話，中國的 GDP 總量在 2020 年前後跟美國持平甚至超過美國是肯定的。

討論這個速度的含義是很有意思的。過世不久的著名經濟史學家 Angus Maddison 教授曾經復原西方早期經濟史的數據後發現，在 18 世紀之前的西方世界，人均收入的變化非常緩慢，人均收入要翻番幾乎要 1400 多年。只是到了英國工業革命之後，隨著技術的革命性進步，很多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才真正加快了，比如很多國家實現了人均收入 2%—3% 的增長速度。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世界不一樣了，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增長特別快的經濟體，主要集中在東亞地區，有日本和東亞四小龍（英文世界裡說成是四小虎）。這些經濟可以保持 7%—8% 的增長率，這樣的話，10 年就可以實現人均收入的翻番。所以，談到高速增長這一現象的話，其實不是很遙遠的事情，也就半個世紀的歷史。

為了解這些高速增長的現象，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簡單而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謂“收斂假說”。意思是說，一個比較落後的經濟有可能實現比富裕的國家更高的增長率。為甚麼有這個可能性呢？因為第一，落後經濟的分母小，增長率容易更高；第二，更重要的是，落後經濟可以模仿發達經濟的制度、技術和生產方式，容易趕超後者，反而處在前沿的國家因為沒有可追趕的對象，所以增長會趨緩。

這個假說非常重要，它至少幫助我們認識了今天為甚麼可能有更多的經濟趕超的現象，而且這些趕超的經濟確實取得了非常好的發展成果。但是，“收斂假說”並沒有給出實現收斂的條件是甚麼。也就是說，它沒有回答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要實現趕超，一個國家該怎麼做。實際上，要獲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去尋找和研讀發展經濟

學或增長經濟學家們的研究文獻，這些文獻試圖從理論上去弄明白一些成功的經濟體成功在甚麼地方。特別要指出的是，1994年世界銀行出版了非常有影響的研究報告《東亞奇跡》，對東亞經濟為甚麼可以實現高速而持續的增長做出了系統性的研究和總結。儘管存在爭議，但這個報告為我們認識經濟收斂發生的條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經濟學家發現，要實現經濟發展，一個國家必須有比較快的資本積累，換句話說，不能把所有的收入都吃掉，因為都吃掉的話，沒有積累，就不能發展了。我這裡引用1979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獲得者Arthur Lewis的一段話，這段話出現在他1954年那篇有影響的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中。他說：“在經濟發展的理論中，核心的問題是要弄清楚一個經濟體從前的儲蓄和投資僅佔其國民收入的4%—5%，甚至更少，是如何能將其自願儲蓄提高到佔其國民收入的12%或15%，甚至更高的。之所以這是核心問題，那是因為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資本（包括資本中包含的知識和技能）的快速積累。”Arthur說得很清楚，經濟發展的最核心問題是加快資本積累，就是這個國家的國民收入中用於儲蓄和投資的部分要大幅度增加，國民收入不能都消費掉了。你看現在歐洲很多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他們為甚麼出現經濟停滯呢，一方面因為收入水平相當高，增長動力沒有了，但是即使這樣也可以看出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國民儲蓄已經很低了，每年掙的錢都用於社會保障和其他消費了，沒有存留，甚至要舉債用於消費和社會福利開支。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於那些非常貧窮的國家，比如非洲，經濟發展一直不盡如人意。甚麼原因？我前幾年到開羅參加一個關於經濟發展的會議，就

專門討論“非洲可以從東亞學到甚麼”這個主題。戰後半個多世紀，世界銀行在非洲嘗試了所有的增長模式，但是沒有一個成功的，任何模式在非洲都不管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儲蓄率過低。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香港、台灣地區以及新加坡、韓國成功實現了經濟增長，而它們的共同特徵就是儲蓄率比較高。為甚麼東亞人儲蓄而非洲人不儲蓄？當然這個是很大的理論問題，一直到現在經濟學家也沒有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簡單的答案。不過，東亞人非常重視子孫後代的財富和幸福，總是朝前看，這是文化的差異造成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實現較快的資本積累呢？蘇聯過去的資本積累也很快，那些曾經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也都有很高的積累率，但是經濟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即使有過高速增長的階段，也只是曇花一現。1960 年的時候，赫魯曉夫在聯合國脫掉靴子敲打主席台，大聲高喊：“我們埋葬你們！”可是不久蘇聯的經濟就出大問題了。原因是甚麼呢？主要是因為技術不進步。你有高積累沒有用，你必須要有技術進步，否則你投資多了，資本的邊際回報出現遞減，所以增長變得不可維持。事實上，對於發展中國家或者比較落後的國家而言，確保資本的積累過程伴隨足夠的技術進步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在過去 20 年裡保持了比較高的投資率（但即使這樣，中國的儲蓄率仍然在多數年份大於投資率），使得資本存量快速增加。我的計算顯示，過去 20 年，資本存量平均每年增長大約 12%，高於改革的頭 10 年，因此資本產出比在 90 年代以後快速提升，而這個時期正是中國 GDP 增長最快的時期。

要指出的是，資本積累的加快伴隨了技術的進步，這是與蘇聯很不同的。在中國，技術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了貿易。中國過去 20 年，進出口貿易增長非常快，而且貿易的擴張主要通過外商在華的直接投資而實現，這是技術進步的重要來源。對中國經濟發展來說，進口甚至比出口更重要，因為相對於出口消費品而言，中國進口的大都是資本品和中間品，所以進口的都是技術、包含在資本品中的技術。以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為途徑吸收和消化國外的技術，並逐步實現技術的本土化和技術升級，是中國技術進步的基本方式。

資本積累是否伴隨了技術進步，大概可以用最簡單的增長核算方法看出來。增長核算的原理是，投入要素的增長率的加權值是否大於或小於產出的增長率，兩者之差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過去經濟學家對蘇聯的增長核算發現，只有 1965 年之前的時候全要素生產率還不錯，但從此以後全要素生產率就出問題了，一直到蘇聯解體，整個蘇聯的經濟都沒有被挽救得了。用同樣的方法研究東亞四小龍，發現這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是正的，這是核心的區別，不要看蘇聯有高積累，韓國也有高積累，但是這兩個增長的機制是完全不同的。絕大多數的東亞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都很好。

迄今為止的研究都發現，中國在高速資本積累期間依然保持了較好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大概每年平均 3%—4%，對 GDP 增長的貢獻平均在 35%—40%。這個成績即使與東亞經濟相比，也是相當不錯的。我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過去 20 年裡面，伴隨資本積累過程的是我們的市場開放、競爭、貿易擴張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所有這些

都幫助中國可以維持較好的技術進步的速度。這也就幫助我們回答為甚麼中國經濟可以增長這麼快的問題。我想，這不僅因為它的資本積累的速度加快了，中國有不斷提高的投資率，我想更重要的是它的總體的投資效率、技術的進步都非常的明顯。

我們還能再增長多久？

現在大家非常關心中國經濟的較快增長趨勢還可以持續多久？坦率地說，經濟學家還沒有很好的辦法去預測未來的經濟增長。不過，“收斂假說”還是能夠幫助我們來思考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從收斂的角度來看問題，那麼我們就需要簡單地討論一下中美兩個經濟的差距了。因為，差距越大，追趕的空間就越大，而差距越小，經濟趕超的速度就越慢。換一個說法就是，人均收入越高，增長越慢。

我記得 2003 年高盛有一個大膽的預測說，2041 年中國經濟總量才有望超過美國，也就是說，中國還要用 38 年才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個預測今天看過於保守，但是在 2003 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均 GDP 畢竟剛剛超過 1000 美元，而且高盛假設中國的人均 GDP 從 1000 美元提高到 5000 美元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率是要從 10% 下降到 5% 的。現在看來，這個假設大大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能力。

在 2010 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之後，國內外出現了關於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的多個預測，其中絕大多數的預測都基於“收斂假說”來考慮未來的增長率變化。比如，如果我假設未來 10—15 年中國經濟可

以保持 8% 的增長率，美國 2%，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保持 3% 的升值速度，另外，我們假設中國的 CPI 通脹水平小於 5%，美國小於 2%。這樣的話，可以推算出中國在 2020 年之前就可以達到和美國一樣的經濟總量。如果我們再務實一點，假設未來 10 年的頭 5 年中國經濟保持 8.5% 的增長率，後 5 年降至 7%，那麼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是 7.75%。假設美國頭 5 年增長 3%，後 5 年增長 2%，那麼美國未來 10 年的平均增長是 2.5%，人民幣對美元每年升值 3%，這樣推算下來中國在 2019 年就趕上美國。這其實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英國《經濟學人》集團 2010 年年底的預測方法。

IMF 2011 年初也公佈過一個關於中國經濟趕超美國的預測結果。不過，它是基於購買力平價方法來預測的。按照 IMF 的換算方法，中國 2010 年的 GDP 總量應該比按照官方匯率換算的美元數據高出 1 倍，差不多應該是 11.2 萬億美元。而美國的 GDP 則沒有甚麼變化，是 15.2 萬億。IMF 在它們的假設條件下預測，到 5 年以後，就是 2016 年的時候，中國 GDP 的總量就在 19 萬億美元的水平，而那時候美國是 18.8 萬億。這樣的話，中國 5 年後就趕上美國了。而且可以計算出，到那個時候，中國經濟的總量佔全球的比重大概是 18%。我用這個邏輯推下去，到 2020 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總量按照購買力平價的換算結果，佔全球應該是接近 25% 了。這讓我想起著名經濟史學家 Maddison 先生曾經復原的一個數據。那個數據顯示，在 1820 年，中國經濟曾經佔全球的份額為 28.7%，而 200 年以後，到 2020 年，中國經濟終於又回到了這個點上，真是風水輪迴轉啊。去年底，在華盛頓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出

版了它的資深研究員 Arvind Subramanian 的一本書，叫做《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陰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用他計算的“經濟主導指數”來估計，中國經濟現在已經是老大了，不是 5 年以後，是現在。而且他對中國經濟的前景非常樂觀。

到目前為止，少有人對 2020 年中國經濟趕超美國的預測持反對意見，我們暫且認為這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不過我要與大家再討論的是，2020 年之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還能再增長多久？

我們知道，即使到 2020 年前後，中國經濟在總量上和美國持平了，但是中國的人均收入還是很低的，大概相當於美國的 1/4，也就是說相當於現在上海和美國的人均 GDP 的差距。假設今天的世界銀行的標準在未來不變，那麼以 15000 美元來衡量，到 2020 年，中國還是一個介於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間的收入水平的國家，而且仍低於東亞四小龍的收入水平。從收斂假說來思考，我們還有快速增長的空間。那麼，這個空間在哪裡呢？這個空間可以維持多久的高增長呢？老實說，這些問題不容易回答。讓我結合一些參數來大體討論一個答案吧。

首先，目前作為中上等收入的國家，中國未來依然有巨大的投資空間。到 2010 年年底，中國資本存量大約是 GDP 的 2 倍多，差不多是 93.3 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 13.8 萬億美元。而美國在 2010 年年底的資本存量是 44.7 萬億美元，我們還只有美國的 1/3 多一點。按照人均計算中國就更低了。2010 年中國人均的資本存量只有 1 萬美元，不到美國的 10%，不到韓國的 20%。即使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

成就，但與美國的差距還是巨大。以鐵路為例，按照規劃，中國鐵路里程在 2015 年將達到 12 萬公里，也僅僅是美國 22 萬公里的一半。現在的 9 萬公里鐵路也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要達到 5 萬公里的里程也要到 2015 年。我們過去 20 年加快了高速公路的建設，但按照密度來算，中國現在仍低於整個 OECD 國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只是他們的 70%。而在中國的內地，這個密度更低。再看城市軌道交通。中國 500 萬人口的大城市將近 100 個，可是現在 80% 的城市是沒有地鐵的，現在的地鐵里程 90% 集中在東部地區。從這個意義來講，即使在 2020 年之後，中國的投資空間依然很大，經濟可改善的餘地依然很大。這個是很重要的。事實上，即使整體上進入了中上等收入的階段，但中國內部的地區之間依然有巨大的“趕超”空間。東部與中西部地區、沿海和內地的人均資本存量差距非常大。以 2009 年的數據為例，沿海 11 個省市的人均 GDP 和人均資本存量比內陸 20 個省市幾乎要高一倍。我們可以估算一下，如果沿海人均 GDP 是 1.2 萬美元，內地平均是 6000 美元，再假設內地有 9% 的增長率，沿海有 5% 的增長率，可以匡算出，內地大概需要 20 年才能收斂於沿海的水平。

到 2020 年以後，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一定會慢下來，但不會太低（如 5%）。我認為平均而言再維持 10 年的 6%—7% 是完全可能的。這不僅因為東亞經濟在人均收入達到中高水平以後都保持過較快的增長，國際上有先例，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內部的地區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資和生產率的改善空間。

為甚麼我對中國經濟從現在起繼續維持 20 年的較快增長有信心

呢？除了以上的分析要點之外，也許還可以從一些參數的變化趨勢推算出來。首先我們來看中國就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我們都知道，所有成功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都表現出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當它的增長重心從傳統農業部門轉向現代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過程中，它的勞動力也就隨之從農業轉向製造業和服務業。這個結構變化的過程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中國也不例外。在過去 30 年裡，製造業和服務業吸納的勞動力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農業勞動力所佔的比重下降了 30%，平均每年下降 1 個百分點。現在，農業的附加值佔 GDP 大約 10% 左右，未來還將會緩慢下降，有研究估計，到 2030 年會下降到 5%—7%，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還將繼續減少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可以預料，按照每年下降 1 個百分點來估計，農業勞動力佔比從現在的 30% 下降到 10% 以下，從而接近農業附加值佔 GDP 的份額，至少還要 20 多年。

從另一個參數來討論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結論，這個參數就是中國城市化率的未來變化。去年有一個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國家統計局說中國的城市化率超過了 50%，這意味著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業人口。城市化率從 20% 到現在的 50%，用了 30 年的時間，平均每年提高 1 個點，這 1 個點的背後是 1000 多萬人成為城市人口。按照這個趨勢推算，未來中國的城市化率要達到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即 70%，從現在起也還需要 20 年時間。因此，我認為，即使 2020 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了，之後應該有不少於 10 年的空間來完成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轉變與現代化，從而維持比較高的增長率。這可以算作一個經驗證據。

我們具備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能力嗎？

從某種意義講，以上的討論還只是給出了未來持續較快增長的必要條件，不一定充分。現在每個人都關心中國未來是否具備再增長的能力。特別是，在需求條件上，中國未來是否可能釋放和維持旺盛的國內需求來支撐經濟的持續增長；能否在未來站到技術的前沿；能否成功實現產業的升級。對於這些問題，今天我只能簡單談一下我的看法。我分為兩個方面的問題來討論，一個是關於未來的國內需求條件的變化趨勢，特別是消費需求和儲蓄率的變化，另一個是關於技術進步和未來產業升級的問題。因為這兩個問題都與現在備受關注的“中等收入陷阱”有關，所以，我下面的討論也有助於回答中國為甚麼不太可能跌入這個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首先討論關於維持未來較快增長的需求條件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要提出來討論，是因為目前非常流行的觀點就是所謂“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的嚴重不足。基於對當前需求不足的判斷，多數人認為消費萎縮使得中國未來不足以維持再增長，相反，增長即將“熄火”。

坦率地說，消費佔比的下降對我而言一直是一個謎團。因為從數據上看，中國家庭消費開支的增長並不慢，這不僅因為這些年社會商品零售額的名義增長率都超過了 17%，也因為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務以及醫療保健和養老等方面的開支增長更快，即使扣除價格因素，其增長率與 GDP 的增長也看不出存在顯著的落差。不僅如此，最近 Subramanian 教授提到，如果把中國和亞洲主要經濟體的人均消費增長